认知性访谈在实习护生工作场所暴力求助动机量表编制中的应用

李瑶[1]　胡洋洋[1]　张梓萱[1]　李娟[2]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重庆 400016；[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务处，重庆 400016

通信作者：李娟，Email：1005945635@qq.com

【摘要】 目的　应用认知性访谈对实习护生工作场所暴力求助动机量表条目进行修订。**方法** 2025年8月至9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重庆市某三甲医院的30名实习护生，进行3轮认知性访谈。依据问题评估系统（QAS-99）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结合研究小组讨论与专家意见修订条目。**结果** 第1轮访谈中，受访者对6个条目提出疑义，主要涉及“模糊”、“措辞”和“敏感性”问题；第2轮访谈中，仅1个条目有疑义，经讨论后保留原条目；第3轮访谈中，受访者均认为条目表述清晰，无需修改，访谈停止。**结论**　认知性访谈能有效发现并修正实习护生工作场所暴力求助动机量表中的理解偏差，提高量表的适用性与科学性。

【关键词】 实习护生；　工作场所暴力；　求助动机；　认知性访谈；　量表修订

【中图分类号】 R47

DOI：10.3760/cma.j.cn116021-20251015-02293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interviewing in developing a Workplace Violence Help-Seeking Motivation Scale for Nursing Interns

Li Yao[1], Hu Yangyang[1], Zhang Zixuan[1], Li Juan[2]

[1]Department of Nurs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16, China; [2]Academic Affairs Offic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16,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Juan, Email: 1005945635@qq.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se the items of the Workplace Violence Help-Seeking Motivation Scale for Nursing Interns using cognitive interviewing. **Methods**　From August to September 2025, 30 nursing interns from a tertiary Grade A hospital in Chongqing were recruited using purposive samp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ree rounds of cognitive interviews. The interview data were coded using the Question Appraisal System (QAS-99), and item revisions were made based on research team discussions and expert feedback. **Results**　In the first round of interviews, participants raised concerns about six items, mainly involving issues of ambiguity, wording, and sensitivity. In the second round of interviews, only one item was questioned and this item was retained after discussion. In the third round of interviews, all participants agreed that the item wording was clear and no further revisions were required, and the interview process was terminated. **Conclusions**　Cognitive interviewing can effectively identify and correct comprehension biases in the Workplace Violence Help-Seeking Motivation Scale for Nursing Interns, thus improving the applicability and scientific rigor of the scale.

【Key words】 Nursing intern;　Workplace violence;　Help-seeking motivation;　Cognitive interviewing;　Scale revision

DOI：10.3760/cma.j.cn116021-20251015-02293

工作场所暴力(workplace violence,WPV)是指工作人员在工作场所受到辱骂、威胁和攻击,从而造成对其安全、幸福和健康的明确或含蓄的挑战,包括躯体攻击、言语虐待、威胁、性骚扰等[1]。实习护生因年纪小、社会阅历少、专业实践能力不足等原因导致WPV的发生率高于正式护士[2-3],严重危害实习护生身心健康,影响其专业认同和未来职业规划[4-5]。面对WPV,及时求助是减轻不良影响、促进心理恢复和保障安全的重要方式,然而调查显示超过50%的实习护生在遭遇WPV后选择沉默[6-7]。Boyle等研究者指出,应进一步探讨护理学生不愿正式报告暴力事件的原因,并寻找能促使其求助的机制[8]。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体的求助行为与求助动机密切相关,求助动机是促使认知转化为行动的心理动力,是决定个体是否求助的重要因素[9-10]。了解实习护生工作场所暴力求助动机水平、预测求助行为对临床教学管理尤为重要。目前,国内外尚无评估实习护生工作场所暴力求助动机的测量工具,不仅限制对求助行为机制的研究,也不利于教学管理部门识别障碍和制定干预措施。因此,开发一份符合实习护生特点、信效度良好的求助动机量表具有现实意义[11]。科学准确的调查工具对于科研工作至关重要,但在实际应用中,量表编制者与受试者对条目的理解往往存在认知差异,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测量数据出现偏差。认知性访谈(cognitive interviewing)能够有效解决此问题,认知性访谈是一种基于受试者思维加工过程的定性研究方法,通过探查受访者理解问题、检索信息、形成答案的认知过程,深度评估其对问卷条目的理解程度与潜在偏差[12]。该方法可用于量表的修订和汉化,能有效识别理解问题,优化条目表述,显著提升量表的信效度与调查结果的可靠性[13]。本研究将认知性访谈应用于实习护生工作场所暴力求助动机量表的研制过程,从实习护生视角对量表初版条目进行修订,提高量表的准确性、适用性和科学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遵循最大差异化原则,于2025年8至9月在重庆市某三甲医院招募正在轮转的实习护生,选取不同科室、年龄及性别的实习护生进行访谈。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③临床实习期间经历过工作场所暴力事件;④具备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排除标准:①因各种原因处于休学、退学状态的学生;②患有精神、心理相关疾病的学生。根据Willis等[14]的理论指导和Blair等[15]的实证研究建议,认知性访谈通常需进行至少3轮,每轮样本量为5~15例,每轮访谈均在资料饱和后停止[13]。本研究最终共完成3轮访谈,累计纳入30名实习护生,均无重复访谈。本研究通过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2024-526-01)。

1.2 研究方法

1.2.1 量表初版的形成

课题组前期通过文献回顾并结合计划行为理论[9]对符合纳入标准的实习护生进行了半结构式深入访谈,构建了涵盖37个条目的初版量表,随后采用德尔菲法[16]对17名专家开展函询,对条目和维度进行2轮评议,删除不相关或弱相关的维度,合并有重复性的条目,形成了初版实习护生工作场所暴力求助意向量表,共25个条目,按照计划行为理论框架划分为意向、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4个维度。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赞同”到“非常赞同”,计1~5分,总分越高表示实习护生在遭遇WPV后越有可能采取求助行为,维度分越高代表相应的意向、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越好。函询专家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函询专家基本情况(n=17)

项目		人数	占比(%)
年龄(岁)	<40	3	17.65
	40~	9	52.94
	50~	5	29.41
职称	中级	0	0.00
	副高	13	76.47
	正高	4	23.53
工作年限(年)	10~	5	29.41
	20~	7	41.18
	30~	5	29.41
研究领域	护理教育、护理管理	8	46.06
	临床护理	4	23.53
	工具开发及评估	5	29.41
学历	本科	5	29.41
	硕士及以上	12	70.59

1.2.2　访谈方法选择

认知性访谈常用出声思维与口头探查两种方法。有声思考是受访者口述自己从读题、思考到答题的整个过程；口头探查是在受访者答完量表后，访谈者依据访谈提纲让受访者回顾每个条目，由访谈者提问，受访者回答，来获取受访者作答时的思维过程及具体信息[13]。考虑到本研究条目多涉及态度、信念等内隐加工内容，且实习护生需在临床语境中回忆与模拟决策过程，为降低出声思维对注意负荷的要求并获取更聚焦的证据，本研究采用口头探查法[17]。

1.2.3　访谈提纲

根据研究目的、Tourangeau 认知理论[18]及相关文献回顾拟定访谈提纲后，结合专家意见和预访谈，形成访谈提纲。具体访谈内容如下。条目层面：①请您用自己的话表述一下该条目的意思。②您认为该词汇包含了哪些意思？③您在作答时，是怎么想的？感受是怎样的？④您出于什么原因选择此选项？⑤您认为该条目有哪些需要改进的，怎么修改更为合适？总体层面：①您认为量表的设计如何（字体、长度等）？②从量表整体来看，您还有哪些改进建议？③从量表内容来看，您认为还有哪些需要补充？

1.2.4　资料收集

在研究开始前，研究人员均接受了认知性访谈相关的课程培训。访谈选择在安静、相对私密的科室学习室和会议室进行，采取一对一方式、全程录音并由访谈者同步记录要点。为确保一致性，所有访谈均由两名受训研究者完成。访谈前，研究者向受访者说明研究目的、匿名与保密原则，并告知受访者在作答时可以使用符号对存在疑义的条目进行标注，征得同意后开始。访谈过程中，访谈者放慢语速，以适度重复和必要解释协助受访者理解，并记录其完成量表的时间。自第二轮起，访谈主要聚焦存在疑义的条目以提高效率。每次访谈约30~40 min，期间访谈者持续撰写笔记并录音。除受访者和研究人员外，现场无其他人员，本研究未出现拒访或中途退出情况。

1.2.5　资料整理与分析

访谈结束后 24 h 内，访谈者将录音及相关资料逐字转录。并将认知访谈数据逐项录入 Excel 表格，以每个调查题目建立独立文档，便于后续单元化分析。随后，研究者使用问题评估系统（question appraisal system，QAS-99）对转录后的资料进行编码[18]。该系统将条目可能存在的问题分为八类，包括阅读、指导语、澄清、假设、知识/记忆、敏感性/偏见、选项及其他共 8 类，通过对调查问题的系统评估，指导量表编制者发现条目措辞或结构中的潜在问题，其中“阅读”和“指导语”不纳入实际编码。所有资料由 2 名研究人员独立编码，并由专家组对不一致部分进行审核。在分析过程中，若存在内容含糊或判断不清之处，将再次联系受访者确认。

2　结果

2.1　受访者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 30 名实习护生，其中男生 8 例、女生 22 例，年龄 18~24 岁，平均年龄（20.8 ± 1.6）岁，受访者教育背景为本科在读或大专实习阶段。三轮认知性访谈样本量及人口学资料见表 2。

表 2　受访者一般人口学资料（n=30）

项目	第 1 轮（n=15）	第 2 轮（n=10）	第 3 轮（n=5）
性别			
男	5	2	1
女	10	8	4
年龄（岁）			
18~20	7	4	2
21~22	5	4	2
≥23	3	2	1
教育背景			
本科	12	8	4
大专	3	2	1

2.2　第 1 轮认知性访谈结果及条目修订

第 1 轮访谈纳入 15 名实习护生，访谈时间 30~40 min/人。总体上，受访者认为量表指导语简洁清晰、长度适中，部分受访者对其中 6 个条目提出疑义。

2.2.1　措辞

受访者反映 1 个条目的语言存在措辞问题，3a 措辞是指条目表述冗长、笨拙、不合语法或语法复杂。具体条目、疑义及修订过程见表 3。

2.2.2　模糊

受访者反映 3 个条目的内容存在模糊问题。

3c 模糊是指条目释义不清或范围不明，是澄清类别中最常见的问题。具体条目、疑义及修订过程见表 3。

2.2.3 敏感性/社会期望问题

受访者反映 2 个条目的表达存在敏感性问题。受访者认为这些表述带有社会期望或评价色彩，在回答问题时感到不适。具体条目、疑义及修订过程见表 3。

2.3 第 2 轮认知性访谈结果及条目修订

第 2 轮认知性访谈，共纳入 10 名受访者。其中 9 名受访者对修改后的量表条目能够准确理解并顺利作答，有 1 名受访者对条目 21“我认为寻求帮助的途径是否明确、流程是否清晰”表示困惑，认为在实际实习过程中对相关流程缺乏经验，因此回答时感到犹豫。根据第 2 轮访谈结果，经研究团队和专家组讨论，条目 21 则保留原表述，但在指导语说明中强调“流程”主要指上报与反馈渠道，以帮助受访者理解。

2.4 第 3 轮访谈结果及量表内容修订

第 3 轮访谈共纳入 5 名受访者。5 名受访者均在 5 min 内完成量表作答，并表示能够准确理解所有条目，未再提出新的修改意见。认知性访谈资料以相对饱和为标准，因此在第 3 轮未发现新的疑义条目。基于上述结果，量表修订完成。

3 讨论

3.1 认知性访谈与量表研制的需求高度契合

认知性访谈与本研究量表编制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实习护生处于由学习者到正式护士的角色过渡期，具有明显的社会心理特征，知觉压力较大，自我复原力不足，可能导致其对暴力情境的识别、求助行为的理解及语言表述的敏感度与量表编制者的视角存在差异[19]。认知性访谈能有效识别并纠正量表中的理解偏差，帮助研究者理解受访者在作答题的思维过程，从而调整不恰当的表述，使量表更符合目标人群的理解方式，体现了该方法在量表开发中的重要价值[17]。访谈结果显示，部分条目在最初版本中存在语义不清、措辞模糊和假设不当等问题。首轮访谈中，受访者对“影响”“伤害”“满意”等词语的理解存在差异，这说明量表编制者

表 3 第 1 轮认知性访谈条目修订结果

修改前条目	疑义频次	条目编码及问题陈述	条目修订意见	修改后条目
1.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时，我会主动寻求帮助	2	6b 敏感性：受访者（1–N2，1N–5）认为“主动”一词带有评价色彩，做题时容易受到期望性的影响而选择正向答案	结合受访者反馈，经讨论删除“主动”以减弱行为评价倾向，使条目表达更中性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时，我会寻求帮助
7. 我认为会因寻求帮助的行为再次受到施暴者的伤害	2	3c 模糊：受访者（1–N7，1–N10）“再次受到施暴者的伤害”表述笼统，不清楚指的是身体、语言还是心理层面的伤害	明确伤害类型，将条目调整为具体可感知的“不满或报复”，以减少理解偏差，并补充说明“如言语攻击或身体伤害”	我认为寻求帮助可能引发施暴者不满或报复（如言语攻击或身体伤害）
9. 我认为寻求帮助会被他人视为小题大做	2	6b 敏感性：部分受访者（1–N1、1–N13）表示“小题大做”带有明显的情绪色彩和贬义，该词令有暴力经历的学生感到不适	将带有主观评价的词语“小题大做”替换为更中性的“不必要”	我认为寻求帮助在他人眼里可能是不必要的
10. 我认为寻求帮助会影响我的实习评价	1	3c 模糊：受访者（1N–6）认为“影响实习成绩”缺乏方向性，不确定是正向还是负向影响	在表达中补充“负面影响”，以明确条目含义并减少歧义	我认为寻求帮助可能对我的实习评价产生负面影响
22. 我认为寻求帮助的过程是尴尬或不自在的	1	3a 措辞：受访者（1–N12）认为“是尴尬或不自在的”结构突兀，缺少动词导致语义衔接不顺，句子整体不够自然	在保持原意基础上补充动词“让我感到”，以增强语言连贯性并符合自然表达习惯	我认为寻求帮助的过程让我感到尴尬或不自在
25. 我不知道寻求帮助后能否得到有效和满意的解决	1	3c 模糊：受访者（1–N3）认为“有效和满意的解决”标准不明确，理解差异较大	根据访谈反馈，将个体主观性理解较强的“有效和满意”改为“妥善”，“解决”改为“处理”，使条目更符合临床实习的语境	我不知道寻求帮助后能否得到妥善的处理

的视角与实习护生的真实理解不一致[20]。认知性访谈恰能弥合这一差距。此外,本研究开发是自我报告式量表。由于应答过程中缺乏互动,受试者与编制者间可能存在理解差异,进而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20]。既往研究指出,响应误差是影响问卷调查结果的重要因素[14]。认知性访谈能够在量表正式应用前通过模拟作答过程及时发现潜在问题,研究者据此进行条目修订,能提高后续心理测量的信度与效度,使测量结果更符合真实情况。从方法论角度确保量表条目的易懂性与适用性,与本研究旨在构建面向实习护生的求助动机测量工具的需求高度契合[21]。

3.2　认知性访谈和QAS-99编码系统提高了量表研制的科学性

应用QAS-99对认知性访谈发现的问题进行编码和解释,使整个研究过程更具科学性。本研究发现,条目存在的问题大多表现为模糊和敏感性,术语的理解偏差和指代对象的不明确,都可能使受访者对条目产生困惑[22]。语言的正负向表达在问卷或量表的编制过程中同样需要仔细斟酌,负向的表达容易使受访者产生抗拒心理,情感程度的表达不应对受访者产生诱导作用[23]。部分受访者在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对部分条目产生犹豫。例如,“主动”这类带有评判倾向的词语会引导答题者做出更符合社会期望的答案,对于同时处于学生与临床护理人员双重身份的护生而言,担心被认为能力不足或依赖性强使他们在面对涉及社会评价的条目时更为谨慎。而“小题大做”这类带有评价色彩的词语会引答题者的不适感,甚至会对经历过WPV的学生再次造成心理伤害,这种反应与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谦逊与克制,人们普遍不愿给他人添麻烦,也不习惯直接表达负面情绪[24]。此类反馈反映了语言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也提示负向或情绪化表达在量表条目中可能引发抗拒或诱导作答,应在编制过程中予以规避[23]。由此可见,在量表编制的过程中应用认知性访谈,能了解目标人群对量表条目理解和作答的过程中存在的认知偏差,以此为依据有效地指导条目修订,对量表编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张丽媛等[25]指出,基于QAS-99编码系统,虽已知问题编码的分类,但在认知性访谈的过程中研究者应坚持质性研究的基本原则,避免以结果为导向诱导受访者回答,条目问题完成的过程应从受访者的视角出发而非研究者的视角。从QAS-99编码系统的访谈质量来看,本研究受访者在交流中能够主动表达观点、澄清困惑,并给出具体建议,显示了较高参与度。实习护生普遍认同量表内容与自身经历和需求密切相关,未超出其实际认知范围,体现出良好的条目契合度[26]。两轮修订后受访者的一致认可进一步证明,基于认知性访谈结果的条目优化和规范使用QAS-99便不仅提升了量表条目的准确性,也增强了测量内容与临床情境的贴合度,弥补了传统护理量表研制过程中简单预试验的不足,提高了量表研制过程的科学性。

3.3　本研究的优点和局限性

本研究以使用者为中心,在量表开发早期引入认知性访谈,从目标人群角度挖掘其在应答过程中的语义困惑和认知偏差等,使量表更贴合实习护生的理解特点和临床场景,提升了量表的适用性和科学性,但后续仍需量性研究验证量表的心理测量学性能。此外,本研究受访者来自单中心,结果推广受到限制,后续将进一步开展多中心研究。

4　结语

本研究在量表编制阶段采用认知性访谈,有效解决了量表编制过程中的认知差异及测量误差,验证了认知性访谈在实习护生工作场所暴力求助动量表编制中的应用价值。目前,认知性访谈多用于文化调试,在本土量表编制中的应用未得到重视,尽管量表编制者和使用人群有着相同的语言和相似的文化背景,但认知差异仍不容忽视,未来应推进认知性访谈在我国本土量表构建研究中的应用。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李瑶、李娟:确定研究题目、提供研究建议、设计研究方案、撰写及修改论文、审校论文;李瑶、胡洋洋:数据收集与整理;李瑶、张梓萱:数据分析

参考文献

[1] Al-Qadi MM. Workplace violence in nursing: a concept analysis [J]. J Occup Health, 2021, 63(1): e12226. DOI: 10.1002/1348-9585.12226.

[2] Johnston S, Fox A, Patterson S, et al. Australian nursing students' experiences of workplace violence during clinical placement: a

cross-sectional study [J]. J Adv Nurs, 2024, 80(12): 4933-4945. DOI: 10.1111/jan.16189.

[3] 周媛媛, 姚倩, 李望, 等. 实习护生工作场所暴力发生率及影响因素的 Meta 分析[J]. 护理实践与研究, 2023, 20(22): 3413-3420. DOI: 10.3969/j.issn.1672-9676.2023.22.017.

[4] Dafny HA, McCloud C, Pearson V, et al. Nursing students' experience of workplace violence in clinical practice: a 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 [J]. J Clin Nurs, 2023, 32(17/18): 6136-6164. DOI: 10.1111/jocn.16746.

[5] 孟宇辰, 王光娅, 刘晓怡, 等. 实习护生工作场所暴力真实体验的 Meta 整合[J]. 护理学杂志, 2024, 39(6): 73-77. DOI: 10.3870/j.issn.1001-4152.2024.06.073.

[6] Yu Z, Kong D, Li Y, et al. Psychological workplace violence and its influence on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among nursing interns in China: a multicenter cross-sectional study [J]. Front Public Health, 2023, 11: 1148105. DOI: 10.3389/fpubh.2023.1148105.

[7] Qian M, Zhu P, Wu Q, et al. Experience of verbal violence among Chinese nursing students in clinical practice: a qualitative study [J]. BMC Med Educ, 2023, 23(1): 768. DOI: 10.1186/s12909-023-04741-z.

[8] Boyle M, McKenna L. Paramedic student exposure to workplace violence during clinical placemen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J]. Nurse Educ Pract, 2017, 22: 93-97. DOI: 10.1016/j. nepr. 2017. 01.001.

[9] Bosnjak M, Ajzen I, Schmidt P.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Selected recent advances and applications [J]. Eur J Psychol, 2020, 16(3): 352-356. DOI: 10.5964/ejop.v16i3.3107.

[10] Gard DE, Sanchez AH, Starr J, et al. Using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o understand motivation deficits in schizophrenia: the 'why' of motivated behavior [J]. Schizophr Res, 2014, 156(2/3): 217-222. DOI: 10.1016/j.schres.2014.04.027.

[11] 马锐, 王宇, 李玉鑫, 等. 认知性访谈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求助动机量表编制中的应用[J]. 中国全科医学, 2023, 26(23): 2907-2911.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2.0739.

[12] Balza JS, Cusatis R, McDonnell SM, et al. Effective questionnaire design: How to use cognitive interviews to refine questionnaire items [J]. J Neonatal Perinatal Med, 2022, 15(2): 345-349. DOI: 10.3233/NPM-210848.

[13] Egger-Rainer A. Enhancing validity through cognitive interviewing. A methodological example using the Epilepsy Monitoring Unit Comfort Questionnaire [J]. J Adv Nurs, 2019, 75(1): 224-233. DOI: 10.1111/jan.13867.

[14] McColl E. Cognitive interviewing. a tool for improving questionnaire design [J]. Qual Life Res, 2006, 15(3): 571-573. DOI: 10.1007/s11136-005-5263-8.

[15] Blair J, Conrad FG. Sample size for cognitive interview pretesting [J]. Public Opin Q, 2011, 75(4): 636-658.

[16] 郑瑞双, 郭巧红. 认知性访谈概述应用及对护理调查问卷设计的启示[J]. 护理学报, 2019, 26(21): 36-40. DOI: 10.16460/j.issn1008-9969.2019.21.036.

[17] Scott K, Ummer O, LeFevre AE.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 reflections on the value and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interviewing to strengthen quantitative surveys in global health [J]. Health Policy Plan, 2021, 36(6): 982-995. DOI: 10.1093/heapol/czab048.

[18] Willis GB, Lessler JT. Question appraisal system QAS 99 [EB/OL]. [2020-05-14].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7938670.

[19] 孔羽, 王晓君, 侯赛宁, 等. 实习护生知觉压力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 自我复原力的中介效应分析[J]. 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 2025, 10(32): 9-12. DOI: 10.19347/j. cnki. 2096-1413. 202532003.

[20] 王媛媛. 医学量表的编制与评价: 理论、方法与实例操作[M].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20.

[21] 安培, 王慧, 丁焱, 等. 基于认知性访谈的年轻乳腺癌患者生育力保存决策辅助工具的文化调试[J]. 护士进修杂志, 2025, 40(3): 243-248. DOI: 10.16821/j.cnki.hsjx.2025.03.004.

[22] 王雪, 李家琳, 邓翠玉, 等. 认知性访谈在膀胱效用症状量表汉化中的应用[J]. 护士进修杂志, 2021, 36(7): 630-632. DOI: 10.16821/j.cnki.hsjx.2021.07.012.

[23] 徐敏, 胥晨逸, 李孝红, 等. 认知性访谈在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生存质量量表研制中的应用[J]. 护理与康复, 2023, 22(6): 11-15. DOI: 10.3969/j.issn.1671-9875.2023.06.003.

[24] 孔凡飞, 杨淇雯.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助人思想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J]. 现代营销, 2024(30): 98-100. DOI: 10.19932/j.cnki.22-1256/F.2024.10.098.

[25] 张丽媛, 卞静如, 沈傲梅, 等. 认知性访谈在乳腺癌相关淋巴水肿患者支持性照护需求量表编制中的应用[J]. 护理实践与研究, 2024, 21(12): 1786-1793. DOI: 10.3969/j.issn.1672-9676.2024.12.008.

[26] Buki LP, Rivera-Ramos ZA, Kanagui-Muñoz M, et al. "I never heard anything about it": Knowledge and psychosocial needs of *Latina*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with lymphedema [J]. Womens Health (Lond Engl), 2021, 17: 17455065211002488. DOI: 10.1177/17455065211002488.

(收稿日期:2025-10-15)

(本文编辑:唐宗顺)